



留住青春的歌 ——读王猛舟小说集《娘子》

□ 韦安礼

世界是永恒的，人生是短暂的。谁留住了青春，谁就永远年轻率气。王猛舟现在已是“知天命”的人了，但是读他新近出版的小说集《娘子》，当年他年轻、率气、活泼、聪慧的形象，就像他书中的那些朝气蓬勃的主人翁一样永远年轻的出现在眼前，让你和他一起回到从前，又年轻了一回！文学之树常绿，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从1981年到1989年，省民委和省文联连续在花溪等地，每年举办一期民族文学讲习班。每两个月，对全省少数民族青年文学爱好者进行培养，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准。

回想起来，王猛舟是改稿班的“小不点”，刚从师专毕业出校，但他的观察力较强。这是他今天创作收获的第一个原因。

说猛舟的观察渗透力较强，有这么一个例：改稿班分组成到全国各地体验和采访，我们组被派到册亨县。在册亨县的那些天，我们除了完成体验和采访任务外，还给册亨县师范的学生和县直机关文学爱好者在师范学校里举办了一次文学创作讲座大课。这样做的好处，不仅开启了册亨县文学创作史上的新篇章，还让每个去册亨县体验生活的学员长了见识，多了一份收获。而能把见知识和收获在当时就创作出文章的只有猛舟和我。我们在采访了竹林寨之后写了《边陲风采》的散文，并发表在《贵州日报》上。更值得一提的是，那时猛舟还不到20岁，就发现了“册亨睡美人”！他对女性的美，升华运用到了对自然界的观察，巧妙地予以比拟，使自然界物像人之体，赋予了鲜艳美丽的大自然的灵性，让静物活了起来。这就是高，是文学创作拟人手法的正确运用，恰到好处。

那天我们从册亨县城乘班车返回贵阳，车到瓮安兰寨路口时抛锚了，大家下车休息，站在路边等司机修车。几十

个人，谁也没有新鲜的发现，唯独猛舟，他发现了册亨睡美人这座美丽的山峰！这本是地球原有的东西，但从没有人发现她的存在和赋予她以美名，而王猛舟独具慧眼发现了她。借用文学批评家的话说，“生活处处都是美，就怕我们眼睛缺乏美。”王猛舟何许人？应该是不言而知。

至于他的刻苦嘛，罗吉万有个精彩的描写：“我记得，大家还在七嘴八舌地说话，一旦灵感袭来，猛舟就谁都不理，旁若无人，自顾进入用功夫，端的是心猿八极，神游万仞。有时思路中途受阻，那鬼样子就特别搞笑。”有一回，我到他的房间去，一推门，见他像鸵鸟一样把头低进被卷的折缝，屁股冲天地板高高翘起，两手摞在肚皮底下。还以为他肚子痛，一问才说是“思路不通”。

猛舟除了有文学天赋之外，其人脉关系也不错。这是他今天创作、为政双丰收的起点。我记得，他在改稿班上人见人爱。他最密切和尊重的除苏晓星、伍路两位老师外，就是我和王安。一有闲我们就在一起聊天，谈创作，谈工作，也谈官道。天南地北，任由神飞。尤其谈官道，小小年纪的他，兴趣不低。谈到高兴时，猛舟就去买酒来请我和王安三人一起把盏。王安酒量不行，醉了就脸红，走路脚也不灵活，我和猛舟扶他过花溪大桥，就像扶一根硬木棒。猛舟就说话逗他，他就“谈文学”。猛舟亦真亦假的伪装“领导”口气说：“您作报告吧，我来主持会议。”

改稿班到南方考察，猛舟和我形影不离，分开后，书信不断。至今他写给我的信我还保存着一大沓，装订成册藏在书房里。今天他的仕途亨通，就像他从事文学创作一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也。

猛舟在他小说集里共收录了十篇文章，除了两篇是写“老者”外，其他八篇都是写年轻人。把每个主人翁写得年轻力壮，活泼可爱，青春燃烧，楚楚动人！就是书中所写的两个老者，他也把老者的思想和思维，写成了年轻人般可爱、可敬可尊。人可老去，精神不衰，青春就长驻。所以“老者”也像年轻人一样，给读者留下了思想青春。我的感觉是，书中的主人翁，无论老少，由于他们都在追求新生活，每个人的生命青春也就光彩无限。

拿《娘子》、《我们场上的吴老者》两篇文章来说。

第一篇《娘子》。说的是娘子姑娘和阿芳后生的婚姻纠葛。他两个是两老庚的后代。两老庚为延续情谊，“更加亲上加亲”，就把两个天真活泼的，还不醒世的小拜堂成亲。两个孩子长大后，在初次的男女群体唱歌寻偶的活动中，阿芳认为娘子在场丢了他的面子。由此两人的婚姻起了裂缝。但阿芳家父母按照族中风俗，用强行戴假壳的方式逼娘子“坐牢”。娘子宁死不屈，奋起反抗，用头撞击为她戴假壳的妇女，“又乱抓乱踢、拼命挣扎，如烈马脱羁。”终于她用反抗摆脱了农村封建礼教清规戒律的束缚，

背乡离井，独自一人跑去城里……

第二篇《我们场上的吴老者》。文中的吴老者，他是乡下场上写对联、印球衣、搞缝纫的艺人。他平时为人做事循规蹈矩，很古板。但经过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启示后，一改常规，免费为青年篮球队队员印了“外国字”（实际是汉语拼音）的球衣。吴老者跟上时代潮流进步了，在年轻人眼睛中从此高大起来。

文中人物的年龄不同，各人所从事的活路不同，环境不同，性格不同，命运不同。但每一个人物都被猛舟写活了：娘子的青春在于她保住了自己的贞洁和自由，而让她的青春更加靓丽和鲜艳；《我们场上的吴老者》、《吴老者的青春在于“枯木逢春发新芽”，他融入了改革开放的洪流之中。

猛舟这样写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话题：年轻人的青春固然美丽鲜艳，而老年人精神上的青春更不能或缺。“人活一口气，草活一滴水”。人，只要具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理想，他的生命，就会焕发出青春青春。这样的青春就会更加灿烂辉煌！

猛舟是布依族，他的小说，大多取材于布依人生活。他所写的布依族的生活故事，无论是人物形象、民俗文化、地理环境，都比较符合客观事实。这与闭门造车的创作方法完全不同。所以，读猛舟的小说，我们有亲切感，亲切感和可信感。比如：“小妹妹，小妹妹，摇摇手走哪？摇摇手走哪？”等郎一路陪成双。“过来玩过来玩，过来达哥坐一坐，过来达哥一坐坐，不得当你要得玩。”这是猛舟在《娘子》这篇小说中描写布依族男女青年在恋爱交往过程中的一个片段，男生约女生去玩唱的歌。这个歌叫邀约（请歌）。女生应答过去的歌，叫应答歌。比如：“正月喊妹是新年，妹在妹家心不闲，若是真心喊妹去，好玩好耍在花园。”只要你是布依族，只要你在布依族当中生活和长大的，你读到猛舟的这些文字，我们当年男女青年在场坝边、在大路上、在寨子边的“布依族凉亭”里，甚至在人家户的火坑（堂）边，唱歌交友、谈情说爱的画面，就会一一展现在眼前，让你进入到布依族独特的文化氛围中，去感受布依族居住在依山傍水、大田大坝、粮丰鱼肥的村寨里，看他们是怎样在“山美、水美、人更美”的环境中，怎样唱歌跳舞，如何勤劳敢拼，怎样热情待客，如何诚实守信和怎样自由自在的那片神圣的土地上过着祥和、幸福美好的生活。

读猛舟的小说，无论其结局是悲是喜，都令读者深深思考——进步了的，不能停步，还需要继续迈进，狭路沉没的思想和行为更应大胆抛弃，落后了的，就应改革开放，加大步伐赶上！这是猛舟全部小说的生命所在，是难能可贵的亮点！这是他对同胞的真爱和希望。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上海行的红色印象

□ 李宏

初夏的上海，骄阳似火。为提升政协委员、政协机关干部的能力和水平，安顺市政协委托上海复旦大学举办了为期一周的政协委员综合能力提升培训。委员们通过专家授课、参观考察、主题研讨、现场教学等的学习内容，受益匪浅，启发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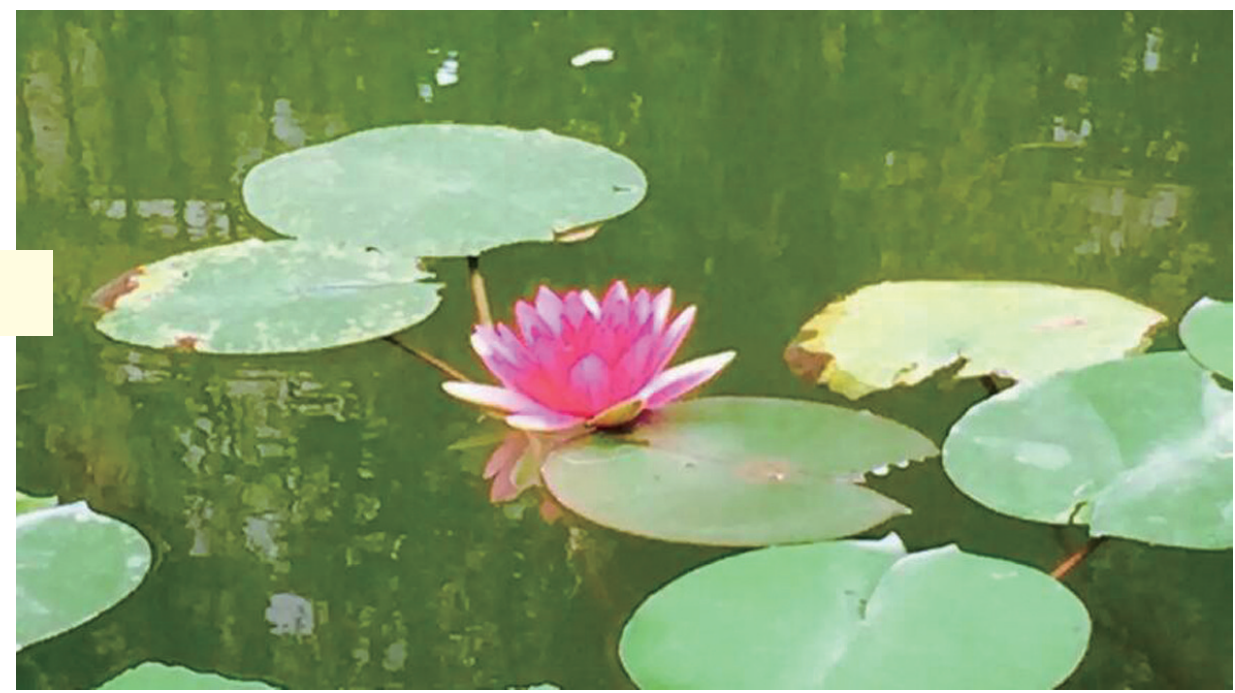
作为49名学员之一，几个现场教学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红色的记忆久久挥之不去，一直萦绕在我心中。

一大旧址 觉醒奋进的见证
中共一大旧址位于上海市兴业路（现望平街）76号，一处普通的石库门两层老楼，会址两旁栽满梧桐的马路见证了来自全国的13位代表在这里初创伟业。就从这幢青墙红砖的石库门里，跨出了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历史性的一步。

走进展厅，立刻被庄严的氛围所感染，鲜红的党旗像一片火焰般布满眼球，感觉是那样的神圣和高尚。在这里每一位参观者都放慢了脚步，眼眸中饱含着追思和敬仰，用心去体会、去品味一件件展品中铭刻的光荣与辉煌。

屏幕上是一大会议中展出的一部分实物，从泛黄的报纸到保存完好的旧照片，以及先辈穿过的旧外套无不让我感慨万千。空气因为历史的厚重变得凝重和肃穆，我的心随着参观的脚步越加凝重，那栩栩如生蜡像定格了这伟大的时刻，仿佛又让我们回到了1921年难忘的峥嵘岁月。

纪念馆中陈列着许多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四十多年的历史文物，是中国人民从受尽屈辱到觉醒奋进的见证。列强侵略中国时分的（时局图）、复旦大学陈望道教授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孙中山、黄兴、秋瑾革命烈士的遗物、手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开展革命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物，一大会议场景、南湖的游船……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自己在思想上对党从发展到成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岁月积淀的精神像陈年老酒在我的心中酿出感情，成为我人生的精神支柱，不断激励着我前行。



鲁迅纪念馆 展现光辉思想和人格魅力

上海鲁迅纪念馆坐落在鲁迅公园（原虹口公园）里，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人物性纪念馆，1951年1月正式开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近年扩建后的新馆。新馆保留了二层庭院式江南民居的风格，正面上镶嵌着周恩来总理题写的“鲁迅纪念馆”五个大字，白底黑字，鲜明醒目。走进大门是一个庭园，右边是“百草园”，种植有许多中学课本学过的鲁迅作品中描写的植物，如首乌、木莲藤等，还有特地从绍兴搬移过来的石井栏、乌篷船等。顺着石级台阶而上，鲁迅先生生平陈列模式新颖，采用专题陈列：新文学开山—新人造就者—文化播火人—精神界战士—华夏民族魂五个展厅，全方位展现出鲁迅先生的文学成就、人生历程、光辉思想和人格魅力，以浓墨重彩展现了一代伟人的熠熠风采。

鲁迅纪念馆拥有文物文献资料二十余万件，大量珍贵的鲁迅手稿、遗物、文献照片，使人倍感亲切。其中有《藤野先生》、《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手稿，《毁灭》的译稿等，先生逝世前两天所写的未完稿《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手稿，告诉我们鲁迅先生真是用自己的笔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令人肃然起敬。展厅中还有鲁迅发表《孔乙己》的《新青年》杂志，刊有鲁迅致中共中央信件部分内容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等珍贵报刊，有鲁迅与宋庆龄、肖伯纳的照片合影，有鲁迅喜爱的金不换毛笔和文房四宝，先生穿过的毛衣、长衫等遗物。……在鲁迅世界里漫步，我的心情难以平静，著名诗人臧克家的诗句一直萦绕在我的耳旁：“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多伦路上的“文学重镇”
上海建成最早的城市马路四川北路北段，一条几百

米长的多伦路静静地延展出去，这条幽静曲折的小街道，曾经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要时刻，被很多人称为“现代文学重镇”。初夏太阳当顶，知了鸣叫的一天上午，我走进了多伦路一幢英式花园别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纪念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小小的多伦路上一度“群星璀璨”，鲁迅、瞿秋白、丁玲、茅盾、郭沫若、叶圣陶等30多位左翼文化人聚居于此，不时进行频繁的文学交流。

走进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一楼展厅展现了85年前左联成立时的场景。在这间普通的教室里，一席讲台、一块黑板、几条长凳，当时的进步文艺家团体，就在此开启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文艺运动。与会50多位作家济济一堂，有的不得不站着，连门外也站了人。

“左联”继承了“五四”新文化传统，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实践，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都为此作了不少翻译、宣传工作，左联作家始终高举“文艺大众化”旗帜，提倡无产文艺的通俗化，竭力来做浅显易懂的作品。

“左联”从成立到解散，短短六年时间，留下了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涌现了“左联五烈士”——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鲁迅先生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等著名文章，“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他预言“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现他们的时候……”左翼作家联盟“六年坚守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化文学传统中一直发展延续着……”

临别上海的那天，滂沱大雨像预约好似的光临上海滩，带走了酷热，留下了凉意。夜晚，漫步在幽静的复旦大学校园里，仰望深邃的夜空，白云缓缓流动，依稀可见繁星点点……短促而难忘的一周过去了，留给太多美好的回忆，久久不能释怀。



天龙二官村的“抗战胜利纪念碑”

□ 黄德洪

七十八年前，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燃起了全面侵华的狼烟。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残酷战争在持续八年之后，正义的中国军民取得了最后的完全胜利。

当时，贵州是抗战后方，平坝亦然。但关于抗战，仍有激动人心的故事。

2015年7月7日，怀着对历史的敬重和对现实与未来思考的冲动，笔者再次到天龙镇二官村瞻仰“抗战胜利纪念碑”。

“抗战胜利纪念碑”塔基是标准的正方形，边长均为4.8米，高60厘米，四平八稳地端坐在山顶上。位于塔基之上的塔身，包括顶端的塔尖，共八层，形状为六棱六面。第一层每面宽为160厘米，高为145厘米。第二层开始，整个塔身呈等差均匀收缩和降低了层高，塔高约10米。塔身正对二官村的一面阴刻有“抗战胜利纪念碑”七个大字，楷书，每个字约为50厘米见方；其右款小字为：“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卅日集贤村全体居民建”，左款小字为：“肖学伦题字”。紧临塔身正面的左侧一面刻有碑文曰：

“……同盟胜利，举国腾欢。一方祸平，万世怡然。国家抗战八载，今始复兴，吾村匪乱四年，亦随国家之胜利而平靖。乡人有双庆之感，爰建抗战胜利纪念碑。其意义之深，盖欲使后来者有所警惕，戒慎恐惧，树立良好乡风，人人以四德为心，八德为志。从兹文……起，日新又新，庶几成一模范乡村，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矣！中华民国三十四年，肖学伦谨撰并书”。

这段碑文，将修建“抗战胜利纪念碑”的背景、缘由及其意义和愿望都作了明确的叙述，极大地方便了后人对于纪念碑，包括对于二官村那一段历史的解读。

此段碑文之后，是修建“抗战胜利纪念碑”时捐款人姓名及捐款数额的记录。

紧临塔身正面的右侧一面碑记是修建“抗战胜利纪念碑”时捐款人姓名及捐款数额的续记。

分别镶嵌于塔身正面左右两侧的这两块碑记，系小楷书写阴刻而成。由于年久及风雨侵蚀，已显斑驳状态，所以，个别字迹模糊，已难辨认。按碑文记载，捐款人数为103人，共捐法币壹拾壹万叁仟元。

据有关资料及知情人士提供，二官村有着较为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村寨背靠的大箐山腰，有一座“明皇浩封车骑将军三世祖考肖公印镇、祖妣肖母詹夫人之陵墓”，墓前石柱上刻有对联：“湖北征南源溯吴宏宏支派（后改为‘继往开来户守国门门驱邪’），光前裕后籍发黔疆振家声。”这座坟墓墓碑首次立于1821年，后于1903年和1987年进行了两次更换修整。碑文记载墓主是1430年阵亡的，说明此墓已有585年的历史。这是二官村历史一个有力的注脚。相传明清时期，村里曾出过不少的举人和贡生，清光绪年间吏部正七品文林郎肖世贤便是其中之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肖世贤之孙肖玉春（又名肖学仁）积极倡导改变村中只有零散私塾状况，兴办新学。1933年，在贾国佐、肖学伦等人支持下，二官村创办了“集贤小学”。由此，二官村曾一度有“集贤村”之谓。二官村形成了重视文化教育、培养人才、关注国家政治的传统风气。缘于这种文化的影响，所以，当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二官村时，村中有识之士肖学伦、汪文明、贾国佐等满心欢喜，迅即在村中奔走相告，传递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

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肖学伦及时提出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修建一座抗战胜利纪念碑的倡议。这一提议得到肖学伦、汪文明、贾国佐、肖尚衡、王登华等人的积极支持和全体村民的响应后，肖学伦、肖尚衡、肖尚衡、王登华等即组织勘察选址、设计制图、筹集资金、选聘石工等筹备工作。纪念碑地址确定在村对面的小箐山上，图纸由肖洪负责设计。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是年农历九月中旬，庄稼基本收完，纪念碑即开工建设。一个多月后，“抗战胜利纪念碑”在小箐山顺利建成。这座纪念碑，是中国抗战历史的一个见证，是当时二官村民关心国家命运、欢呼胜利、欢呼和平的见证。同时，如碑中所言，“盖欲使后来者有所警惕，戒慎恐惧”，也是对后世子孙留下的深刻教训。